

《歐美研究》第三十九卷第三期 (民國九十八年九月), 489-532  
http://euramerica.ea.sinica.edu.tw/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 種族因素對於黑人女性活動影響之研究 ——以瑪麗泰瑞爾為例, 一八九一~一九二五

黃文齡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11529 台北市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E-mail: wlhuang@sinica.edu.tw

### 摘要

史家卡爾頌以「黑人女性的維多利亞特質」論述分析十九世紀末中產階級黑人女性參與公領域活動。本研究以瑪麗泰瑞爾在一八九一~一九二五年之間的活動為例, 沿用卡爾頌的論述, 進一步探討種族因素對於中產階級黑人女性活動的影響與意義。研究發現, 在面對白人主流社會, 種族因素不僅影響黑人社會對於女性特質的定義, 規範其在公、私領域的活動, 也以種族優先之名, 合理化中產階級黑人女性在公領域活動的正當性, 讓她們比白人女性有更多發展的機會與空間。當黑人女性在公領域的活動被賦予種族使命時, 黑人兩性互動關係也逐漸產生變化, 泰瑞爾夫婦就是最佳的例證。

**關鍵詞：**瑪麗泰瑞爾、羅伯泰瑞爾、黑人女性的維多利亞特質、政治家務化

---

投稿日期：97.8.26；接受刊登日期：98.3.24；最後修訂日期：98.4.6

責任校對：張文綺、蕭博仁、張滌之

[T]he essential problematic of African-American life: One ever feels his twoness—an American, a Negro; two souls, two thoughts, two unreconciled strivings; two warring ideals in one dark body, whose dogged strength alone keeps it from being torn asunder.

—W. E. B. DuBois (1961: 17)

## 壹、前言

黑人女性研究在一九八〇年代開始出現，投入研究者多為非裔女性史家，如漢恩 (Darlene C. Hine)、鍾斯 (Beverly W. Jones)、泰伯葛潘 (Rosalyn Terborg-Penn)、哈列 (Sharon Harley)、諾凡頓摩頓 (Cynthia Neverdon-Morton)。在諸多著作中，她們描述了黑人女性在美國內戰 (Civil War, 1861-1865) 後，如何透過社團組織，在公領域為改善種族境遇而努力。黑人女性在歷史上的貢獻開始受到注意。

泰伯葛潘在 *African American Women in the Struggle for the Vote, 1850-1920* 一書中，探討黑人女性爭取投票權的過程。研究指出，黑人女性在婦女投票權運動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 中所爭取的是全民投票權 (universal suffrage)，同時兼顧種族與女性的需求 (1988)。漢恩的 *When the Truth is Told: Black Women's 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Indiana, 1875-1950* 探討美國印第安那州黑人女性的社團活動 (1981)；她的另一本書 *Hine Sight: Black Wome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則以十四篇文章分別申論黑人女性在歷史上的表現 (1994)。鍾斯的 *Quest for Equality: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Mary Eliza Church Terrell, 1863-1954* 以瑪麗泰瑞爾 (Mary Church Terrell, 1863-1954; 以下簡稱泰瑞爾) 為例，探討中

產階級黑人女性在爭取黑人平權過程中的努力 (1990)；蕭 (Stephanie Shaw) 在其作品 *What a Woman Ought to Be and to Do: Black Professional Women Workers during the Jim Crow Era* 中，比較中產階級白人女性和中產階級黑人女性參與改革的心態與在目標上的差別：白人女性藉由參與社團活動，突破白人社會對於女性所加諸的種種限制；黑人女性則透過這些活動證明她們有能力完成社會對於女性的期待，值得白人社會尊重 (1996)。懷特 (Deborah Gray White) 則在 *Too Heavy a Load: Black Women in Defense of Themselves, 1894- 1994* 中從社會與階級的角度探討黑人女性的社會運動 (1999)。

從黑人婦女研究的角度來看，這些學者的成果是具有意義的。長久以來黑人女性的歷史角色一直被忽略，她們的生活經驗甚至不被視為「女性」的生活記錄。當史密斯羅森伯格 (Carroll Smith-Rosenberg) 的“The Female World of Love and Ritual” 為婦女史研究開啓了一扇門 (1975)，當樂那 (Gerda Lerner) 提出應該注意黑人女性社團活動時，都沒有為黑人婦女研究注入活水 (1974)。在黑人社會亦然。黑人歷史之父烏德遜 (Carter G. Woodson, 1875-1950)<sup>1</sup> 在描述黑人女性或黑人女性活動時，並沒有賦予她們特殊的歷史意義 (Morton, 1991: 48-49, 55-66)。

雖然費藍司耐爾 (Eleanor Flexner) 的 *Century of Struggle*

---

<sup>1</sup> 烏德遜一八七五年出生於維吉尼亞州 (New Canton, Virginia) 的一個奴隸家庭，擔任過哈渥大學文學院院長 (Dean of t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t Howard University)。一九一六年，烏德遜組織「黑人生活與歷史研究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and Life)，其組織刊物為 *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專門刊載黑人史家的研究論文；成立「聯合出版社」(Associated Publishers)，專門印製黑人教科書與出版黑人歷史相關書籍。烏德遜在保留與宣揚黑人歷史方面的成就卓越。

(1996)、藍戴爾 (Joyce Ladner) 的 *Tomorrow's Tomorrow: The Black Women* (1995)、歐耐爾 (William O'Neil) 的 *Everyone Was Brave* (1971)、費丹 (Betty Friedan) 的 *The Feminine Mystique* (1963)、伯格 (Barbara Berg) 的 *The Remembered Gate* (1978) 到愛森斯坦 (Zillah Eisenstein) 的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1979) 都有黑人女性活動的紀錄，但他們在討論黑人女性時，仍沿用白人的觀點作為價值規範的標準，以白人女性的經驗視為所有美國女性的經驗，忽略黑人女性經驗的獨特性。

在非裔女性史家的努力下，威廉斯 (Fannie Barrier Williams, 1855-1944)、葉慈 (Josephine Silone Yates, 1859-1912)、露芬 (Josephine St. Pierre Ruffin, 1842-1924)、威爾斯巴奈特 (Ida B. Wells-Barnett, 1862-1931)、泰瑞爾、貝舒 (Mary McLeod Bethune, 1875-1955)、帕克絲 (Rosa Parks, 1913-2005)、貝茲 (Daisy Bates, 1914-1999)、哈曼 (Fannie Lou Hamen) 等中產階級黑人女性在公領域的表現逐一展現，特別是參與民間社團組織方面，凸顯她們的獨特性。<sup>2</sup>

史家如何解釋十九世紀以來女性參與公領域事務的現象？一九八四年史家貝克 (Paula Baker) 以 “The Domestication of Politics: Women and American Political Society, 1780-1920” 一文，針對中產階級白人女性爭取投票權的過程，提出「政治家務化」(political

---

<sup>2</sup> 以貝舒為例，她積極參與「全國黑人女性聯盟」(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ored Women) 的活動，為提昇種族地位而努力；她成立「黑人女性全國聯合會」(National Council of Negro Women)，促進美國國內種族融合，並將國內種族議題與國際有色人種問題接軌。貝舒也以實際行動協助美國黑人，在羅斯福夫人 (Eleanor Roosevelt, 1884-1962) 的牽線下，幫助羅斯福總統推動「新政」(New Deal) 中與種族相關的政策，推薦黑人女性進入政府決策部門，讓她們有機會實際參與政治 (Daniel, 1970: 108; McCluskey, 1994: 76)。

domesticity) 之論述，討論中產階級白人女性如何將她們對於家庭的重視與在道德上優於男性的特質，投注對於廉能政府的關切上，進而合理化她們參與公領域事務的行為。因此貝克認為中產階級白人女性在公領域的活動，是將她們對於私領域的關切延伸至公共領域的具體表現 (1984)。

在貝克的研究中，他將「家」視為私領域，「家」以外的地方則屬於公領域的範圍，筆者沿用其定義標準，闡釋「紐約市婦女會」(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在一九二〇年的活動。研究發現影響該組織活動的關鍵，在於潛藏其後的思考模式——「家」的觀念，這是她們動力來源，而政治家務化拓展了婦女活動的空間，並經由「市政管家」(municipal housekeeper) 具體落實。<sup>3</sup> 市政管家不僅合理化了白人女性參與公領域活動，對於影響「家」的任何不良因素採取行動外，也顛覆女性應該待在家中的傳統觀念，政治家務化的思維模式已經將傳統加諸於女性身上的限制轉變成為行動的力量。白人女性認同自己的身分不僅是女性，也是市民，有權利關心政治，除了將對市政的關心付諸行動外，並制訂法律保障其權益 (黃文齡，2001)。<sup>4</sup> 這是一個突破。

但矛盾的是，紐約市婦女會卻又常常凸顯女性在管理家務上的「專業」，顯示出她們的主要目標並不在於取代或與男性競爭，以「家」的觀念參與公領域的事務，心態上就是認同傳統的觀念——男性仍為一家之主，只要能夠達成既定的目標，即使是由男性主導，她們也樂於接受。這也可以說明何以她們在要求紐約市市政府

<sup>3</sup> 這個觀念最早是由皮爾斯 (Zina Fay Peirce) 和可麗 (Jane Cunningham Croly) 於一八六九年時所共同倡導的，主要是為婦女提供一個活動的空間，後來這一個概念被婦權運動者所採用，以婦女在家庭中的角色來合理化婦女對於城市生活的關切 (Hayden, 1981: 79; Blair, 1980: 73-115)。

<sup>4</sup> 該文發表後，將「紐約市婦女俱樂部」的中譯文統一為「紐約市婦女會」。

指派女性出任公職時，所提的全為副手的工作，即便是她們自認為最專業的事務上亦是如此 (Conway, 1971-72: 151, 166, 174; 黃文齡, 2001)。

貝克的政治家務化論述反映美國進步時期 (Progressive Era, 1890-1920s) 中產階級白人女性參與公領域活動的態度與特質，討論了性別與階級的問題，卻沒有提及種族問題。在同時期，中產階級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一樣也關心家庭與社會 (Lerner, 1972: 461-467; 1974: 167)。因此，我們要問，貝克的論述是否可以同樣用於解釋中產階級黑人女性參與公領域活動？在白人社會裡，男性左右了公領域與私領域的界定，黑人男性是否也具有這樣的權力？史家要如何解釋中產階級黑人女性在公、私領域中的活動特質？

筆者認為如果加入種族因素，用政治家務化來解釋進步時期中產階級黑人女性的活動時，就會產生侷限性。政治家務化成立的先決條件是公、私領域界限清楚區分；男人肩負起保護女性、維持家計的責任，女性以家庭為重心，而且在道德上是純潔的。反觀黑人社會，在種族隔離與種族歧視之下，黑人男性面對完全不同於白人男性的生活經驗，有時公領域的活動反而會讓黑人男性更不像男人 (hooks, 1984: 76-77, 91, 94)。相反的，黑人女性必須外出工作，有的甚至成為家庭經濟的主要支柱。在種族因素的影響下，白人對於性別角色的定義並不適用於黑人，黑人社會對於公、私領域活動的認定早已經出現模糊地帶。再者，白人社會輕蔑黑人女性，認為她們在行為上不檢點，道德上有瑕疵，白人女性甚至拒絕黑人女性加入她們的社團組織。因此，在兩個先決條件都無法成立的情況下，用貝克的政治家務化詮釋黑人女性活動，其適用性值得商榷。

一九九二年史家卡爾頌 (Shirley J. Carlson) 提出的「黑人女性的維多利亞特質」(Black Victoria) 論述，針對十九世紀末中產階級

黑人女性參與公領域的行為提出分析 (1992)。黑人女性的維多利亞特質也就是黑人的女性特質，規範黑人女性行為舉止。在私領域中，援用白人的女性氣質 (the cult of true womanhood) 作為標準，也就是黑人女性要像白人女性一樣，忠於私領域的職守，做好母親、妻子的工作，在家相夫教子，穿著得宜，進退有據。<sup>5</sup> 但和白人女性不同的是，黑人社會認為黑人女性和男性一樣肩負種族成敗興亡的責任，因此將公領域的活動視為展現黑人女性特質之必要條件。

黑人社會鼓勵黑人女性參與公領域的活動，所以會用不同於白人社會的價值觀評斷黑人女性的成就。卡爾頌在文章中以美國伊利諾州黑人社會對於黑人女性接受教育的態度為例，凸顯出種族因素居中的影響力。對白人社會而言，女性接受教育是為了日後家庭生活作準備，但黑人社會卻認為知識賦予女性力量，讓她們有能力肩負提昇種族的責任。在白人社會中，女性接受教育被視為減損男性氣概與去女性化的象徵，黑人社會卻十分敬重有知識的黑人女性，認為她們是種族的榮耀，敬稱她們為「種族的女性」(race women) (Carlson, 1992: 63)。此外，黑人社會讚揚在公領域有所表現的黑人女性；「全國黑人女性聯盟」就特別推崇那些從事教育工作的會員，認為她們正在實踐種族未來百年大計的責任 (Davis, 1933)；黑人報紙《論壇》(Forum) 表彰有智慧、有高教育水準或在公領域表現的中產階級黑人女性，譬如泰瑞爾、葉慈、威爾斯巴奈特，「她們善用時間於研讀與旅行上」(Carlson, 1992: 68)。威爾斯巴奈特也因為

---

<sup>5</sup> 白人的女性特質重要的特徵，如順從 (submissiveness)、純潔 (purity)、虔誠 (piety)、有道德、謙虛、利他 (altruist)、居家 (domesticity)。相關研究可以參考 Degler (1980: 307); Lystra (1989: 127); Perkins (1983); Rothman (1984: 250); Smith-Rosenberg (1985: 13); Welter (1973)。

反私刑的努力受到黑人社會的讚譽：「她用智慧、成熟的筆觸、清脆嘹亮的聲音對抗任何形式的種族隔離與種族歧視」(Davis, 1933: 186-187)。顯然黑人社會肯定黑人女性在公領域中個人的表現與對種族的貢獻。

本論文則以泰瑞爾為個案研究，進一步探討種族因素與中產階級黑人女性活動的關係。選擇泰瑞爾為研究的對象，除了她本人具有全國性的知名度，是黑人社會中傑出女性外，她的丈夫羅伯泰瑞爾 (Robert Heberton Terrell, 1857-1925) 有深厚的法學素養，活躍於政壇。其次，因為他們夫妻兩人均為公眾人物，比較容易取得研究資料。筆者想藉史料上的優勢，從他們夫妻之間的互動與對於爭議性問題的看法中，進一步探討種族因素對於中產階級黑人女性活動的影響及意義。

本研究將時間分段點限定在一八九一年到一九二五年，一八九一年泰瑞爾與羅伯泰瑞爾結為連理，開始積極參與社團活動，一九二五年羅伯泰瑞爾過世，泰瑞爾將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撰述傳記上，減少公開活動，因此一八九一年到一九二五年是泰瑞爾在公領域活躍的歲月。

過去討論或與泰瑞爾相關的學術論文或文章中，我們可以發現其共同的特色是偏重於泰瑞爾在公開場合演說與參與社團組織方面的表現。在諸多研究中，學者們從教育家、民權運動者和女權主義者的角度剖析泰瑞爾。其中以鍾斯的*Quest for Equality: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Mary Eliza Church Terrell, 1863-1954* 一書最為詳盡。這本書共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以介紹泰瑞爾生平事蹟為主，第二部分為收集與泰瑞爾相關的史料，特別是其演講詞與出版文章，佔全書三分之二的篇幅。鍾斯從女性主義者與種族領袖的角度，探討二十世紀黑人女性在面對種族與性別雙重困境下所做的回



應。本書除了深度探討泰瑞爾在公領域的活動之外，它另一個貢獻在於提供完整的參考書目。因為一手史料分散，<sup>6</sup> 所以有些文章會以提供新史料為主，譬如米樂 (M. Sammy Miller) 在其文章 “Mary Church Terrell’s Letters from Europe to Her Father” 中，就提供了數篇未發表私人信函，從中可以看到泰瑞爾在歐洲遊學的心境，以及父親在財務上贊助的情形。這些訊息彌補了我們對於泰瑞爾的私生活中了解之不足，格外珍貴。伯薩爾得 (Jinx C. Broussard) 的 “Mary Church Terrell: A Black Woman Journalist and Activist Seeks to Elevate Her Race” 則從新聞學探討泰瑞爾如何運用傳播媒體，宣揚黑人女性的理念與形塑黑人形象，是諸多相關研究中較為特別的一篇 (Broussard, 2002; Miller, 1976)。

本文使用的資料，除了採用泰瑞爾的演講稿、出版品之外，<sup>7</sup> 也使用泰瑞爾個人傳記 *A Colored Woman in A White World*，它詳盡地記錄了泰瑞爾的一生，特別著重公領域的活動 (1980)。<sup>8</sup> 有關其夫

<sup>6</sup> 資料分散於各個不同的圖書館也反映出研究黑人女性最大的困難之一。以泰瑞爾的資料為例，除了她的自傳外，要完整收齊已發表的文章、演講內容，以及散見於其他雜誌的小品，實屬不易。泰瑞爾在全國黑人女性聯盟的活動資料散見於「摩藍—史賓卡中心」(Moorland-Spangarn Center, Howard University)、美國國會圖書館 (Library of Congress)、以及全國黑人女性聯盟總部的檔案中心 (National Headquarters of NACWC, Washington, DC)。泰瑞爾與家人、朋友的信件相關資料則保存在微卷 *The Papers of Mary Church Terrell* (M.C. Terrell, 1977) 與 *The Papers of Robert H. Terrell* (R. H. Terrell, 1977) 之中。

<sup>7</sup> 請參考 M. C. Terrell (1900; 1902; 1904; 1905; 1907; 1912; 1927, January 9; 1927, May 14; 1940; 1943; 1950; 1953; 1984; 1990a)。

<sup>8</sup> 一九一〇年時泰瑞爾就想要為其一生留下紀錄，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她才有時間規畫相關事宜，一九三八年完成自傳，初定名為 *A Mighty Rocky Road*，後才更名為 *A Colored Woman in A White World*。自傳出版的過程並不順利，遭多家出版社的拒絕，在凱特 (Carrie Chapman Catt) 的介紹下，她將作品交給華盛頓特區的出版商巴伯 (William Barbour) 審閱，巴伯建議她重寫，才會考慮協助出版。泰瑞爾幾經考量決定交由朗斯代爾公司 (Ransdell Company) 負責。一九四〇年自傳出版，她

羅伯泰瑞爾的史料與研究數量少。除了一些微卷資料外，可以用的直接史料相當有限，本文由其活動範疇與接觸人物中尋求蛛絲馬跡，在華辛頓 (Booker T. Washington, 1856-1915)<sup>9</sup> 的檔案與往返信件等資料中發現他在華盛頓特區活動的情形。在泰瑞爾的微卷中，則偏重羅伯泰瑞爾私人的書信手札與家書。這些資料都是本研究所倚重的重要史料。

本論文與其他研究論文不同之處在於同時著重於泰瑞爾在公、私領域的活動表現，以卡爾頌的黑人女性的維多利亞特質論述為基調，探討種族因素對於中產階級黑人女性活動的影響及其意義。本文將從家庭生活、顧及羅伯泰瑞爾仕途等面向，討論泰瑞爾如何努力滿足白人社會對於女性的期望。當面對黑人社會時，泰瑞爾採取不同的態度，本文將藉由她與華辛頓對於教育觀點的衝突，探討泰瑞爾如何發揮黑人女性對於黑人種族的責任。最後，將從改變黑人女性活動空間區隔、面對白人文化、兩性互動影響等三方

---

藉由演講和與親朋好友的書信，以一份 2.5 美元的價錢推廣行銷。一九四二年就已經有一千份的銷售量。*A Colored Woman in A White World* 全書約 421 頁，由威爾斯 (H. G. Wells) 為其作序。在文章中泰瑞爾表示這本書的完成並非在炫耀自己的豐功偉業，只是在記錄一位黑人女性如何克服橫亘於前的種種阻礙，追求社會的公平正義與真理。對於 *A Colored Woman in A White World* 一書，各家評論不一。一位為 *Michigan Chronicle* 撰文的記者馬丁 (Gertrude Martin) 認為這本書不僅僅是自傳而已，它記錄了一位黑人女性的經歷與成就 (B. W. Jones, 1990: 64)。

<sup>9</sup> 華辛頓生於一八五六年四月五日，是一位黑白混血的黑人 (Mulatto)，父親是白人，姓氏不詳，母親則為黑奴，後隨繼父佛格森 (Washington Ferguson) 居住。十歲進入礦場工作，在礦工雇主妻子的鼓勵下，於一八七二年進入漢普敦農業學校 (Hampton Agricultural Institute) 就讀。當時的校長是阿姆斯壯 (Samuel Armstrong)，他相信對於一個自由身分的黑人而言，學得一技之長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這個觀念深深影響了華辛頓的教育哲學。在他一手創辦的塔斯各濟學校 (Tuskegee Institute) 就強調一技之長的教育目標，使得對黑人教育持懷疑立場的南方白人放下戒心，如卡內基 (Andrew Carnegie)、杭廷頓 (Collis Huntington) 都提供資金，協助學校發展。

面，討論種族因素對於中產階級黑人女性的影響與意義。

## 貳、泰瑞爾夫婦

泰瑞爾是二十世紀美國傑出黑人女性之一，活躍於黑人女性社團組織與華盛頓特區的社交圈，以「民權運動之老祖母」(Grandmother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稱著。其夫羅伯泰瑞爾為知名的律師、法官。泰瑞爾一八六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出生於田納西州孟菲斯市 (Memphis, Tennessee)，其父羅伯恪區 (Robert Reed Church) 是南方第一位黑人百萬富翁，<sup>10</sup> 泰瑞爾是在優渥的環境下成長。一八八四年畢業於歐柏林學院 (Oberlin College)，<sup>11</sup> 並在華盛頓特區和俄亥俄州等地教書。泰瑞爾精通多國語言，身兼詩人、演說家、作家和教育家於一身，<sup>12</sup> 擅長用她的筆和演說等方式，讓世人了解美國境內黑人的處境 (B. W. Jones, 1990, 1993; Smith, 1992: 1115-1119; M. C. Terrell, 1980)。她是第一位擔任華盛頓特區教育局 (Board of Education in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董事的黑人女性，也曾擔任全國黑人女性聯盟董事會主席，熱衷參與婦女投票權運動 (Gatewood, 1990: 33-144; M. C. Terrell, 1980: 383-384)。

泰瑞爾一生經歷了內戰後的重建時期 (Reconstruction Era)、進

<sup>10</sup> 羅伯恪區之所以可以成為百萬富翁要歸功於一八七〇年代南方嚴重的黃熱病疫情 (Yellow Fever)，許多白人因此離開，留下大片土地，讓羅伯泰恪區有機會藉由從事房地產事業致富。

<sup>11</sup> 歐柏林學院位於俄亥俄州，歐柏林學院的學生或教職人員在內戰前就已經積極參與反奴運動。早在內戰前，許多逃跑的黑奴都可以在歐柏林學院獲得協助，進入加拿大，有的則將歐柏林學院視為保護站，以免再度被抓。

<sup>12</sup> 泰瑞爾透過報紙以及她個人的作品讓白人了解黑人的生活及相關訊息。泰瑞爾個人比較偏好用短篇小說表現黑人的生活 (M. C. Terrell, 1943, 1980)。

步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大恐慌 (Great Depression)、「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一九五〇年冷戰 (Cold War) 初期，透過對她的研究可以了解在這段歷史中黑人與白人的互動關係，以及黑人女性爭取種族權益的努力，因此深受史家青睞。<sup>13</sup>

有關羅伯泰瑞爾的相關研究甚少，不過從他就學、就業的經歷來看，他也是出身中產階級以上的家庭。羅伯泰瑞爾畢業於敦拔高中 (Dunbar High School)，也是第一個自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的黑人。<sup>14</sup> 泰瑞爾引以為傲，聲稱除了成為總統夫人之外，能夠嫁給哈佛大學畢業生為妻是最明智的選擇 (M. C. Terrell, 1977; 1980: 125)。他曾擔任M街高中校長，在運用影響力協助該校畢業生進入哈佛大學就讀方面貢獻良多，在法界的表現也是有目共睹，一九〇一年，在華辛頓向老羅斯福總統 (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19) 的推薦下，羅伯泰瑞爾成為華盛頓特區首位黑人聯邦法官 (Judge of the Municipal Court in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成為「華辛頓幫」(Washington Machine) 中極具潛力的政治明星。<sup>15</sup>

<sup>13</sup> 請參見B. W. Jones (1982a, 1982b, 1990); Broussard (2002); Campbell (1986); Cherry (1997); Chittenden (1975); Eisenmann (2005); Gozemba & Humphries (1989); Leone (1989); Marable (1983); McCluskey (1999); Miller (1976); Render (1975); Russell (1995)。

<sup>14</sup> 根據蓋特伍德 (Willard B. Gatewood) 的研究指出，黑人中產階級不僅重視家世、族譜、教育水準，對於學校的選擇也十分謹慎，新英格蘭地區的私立學校、華盛頓特區的敦拔高中 (前身為M街高中 [M Street High School]) 等公立學校都是他們的最愛，哈佛大學的黑人畢業生也有其專屬的校友社團 (Gatewood, 1990: 74)。

<sup>15</sup> 當羅伯泰瑞爾知道自己被推薦爭取聯邦法官一職時，他表示比較喜歡在學校工作，也比較適合這樣的工作；但他仍會全力以赴，為種族進步努力 (Washington, 1972-1989, vol. 6: 295, 314-315)。

## 參、面對白人社會——泰瑞爾實踐白人女性特質

### 一、謹守女性照顧家庭的天職

泰瑞爾婚後的行為是以白人社會對女性的期望為依歸，她自歐柏林學院畢業後，想以教職為業，即使在父親強力反對下，依然堅持外出工作。但她卻在婚後毅然退出職場，成為全職的家庭主婦，因為「男性應該是家庭經濟的主要支柱，女性的幸福端視男性的能力」(Broussard, 2002: 25)。泰瑞爾自六歲就離家寄宿學校，加上家境富裕，沒有學習家務的機會，父親還笑她連燒開水都不會，但在婚後她努力扮演稱職的母親與妻子角色，學習烹調與布置家庭，堅持親自處理家事，全心投入家庭生活 (M. C. Terrell, 1980: 120-121, 123-126, 413-414)。泰瑞爾為了想當母親，一度婉拒出任華盛頓特區教育局董事 (Render, 1975: 313)。<sup>16</sup> 新婚後五年內連續失去三個剛出生的孩子，泰瑞爾在自傳中常用其早夭的孩子作為回憶片斷的時間分界點，可見失去嬰兒，對她造成的心理傷害之深 (M. C. Terrell, 1980: 106-108, 114)。為了要幫唯一存活的女兒菲麗斯 (Phyllis Terrell) 找個伴，泰瑞爾過繼姪女瑪立 (Mary Terrell)。<sup>17</sup> 泰瑞爾關愛菲麗斯和瑪立，她的日記、自傳或家書都是有力的佐證。泰瑞爾樂意與孩子相處，陪她們聽歌劇，看電影與旅行。菲麗斯生病，她取消所有行程，徹夜不眠地照顧 (M. C. Terrell, 1977: 721, 743, 755-762; 1980: 239, 242-243)。泰瑞爾一切以家庭、家人為優先，忠於相夫教子的角色，她認為這些都是在表現黑人女性的特

<sup>16</sup> 在第三個孩子出生不久即死亡之際，著名的支持廢奴運動者普威斯博士 (Dr. C. B. Purvis) 推薦泰瑞爾擔任華盛頓特區教育局董事一職，因為其教育與所受的訓練足以代表華盛頓特區的黑人。泰瑞爾因當時只想當媽媽，而予以婉拒。

<sup>17</sup> 至於何時領養，泰瑞爾從未提及，只有在其傳記及給羅伯泰瑞爾的家書中稍為帶過 (M. C. Terrell, 1977: 748-751; 1980: 116-117)。

質，「我希望展現出黑人女性最好的一面」(M. C. Terrell, 1980: 7, 23)。

## 二、處處顧及羅伯泰瑞爾的政治前途

種族問題一直是黑人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痛。泰瑞爾和許多黑人一樣，自小就有被歧視的經驗。四歲那一年，泰瑞爾第一次面對種族歧視。她和父親一起搭乘火車，他們買的是頭等艙，卻被列車長趕到黑人專用隔離車廂；而她在學校裡被嘲笑的經驗，也讓她深知所受到的一切羞辱都是因為自己的膚色所造成的 (M. C. Terrell, 1980: 7, 23)。

一八八八年在父親的贊助下，泰瑞爾遊學歐洲。她在法國、德國、瑞士、義大利和英國遊學期間，並沒有因為膚色的關係受到任何歧視待遇，這些經驗加強了她對於種族平等的信念。當回家的時間逼近時，泰瑞爾面臨抉擇：她要繼續留在歐洲，抑或回到美國，和她的苦難同胞一起過著被歧視的「邊緣人」(marginal person) 生活？在對種族責任心的驅使下，泰瑞爾決定返回美國，投身於追求種族的平等，提昇種族福祉之列 (B. W. Jones, 1990: 12)。

泰瑞爾的父親與道格拉斯 (Frederick Douglass, 1818-1895)<sup>18</sup> 為舊識，私交甚篤。泰瑞爾一八九〇年回國後，就投入協助道格拉斯爭取黑人民權的行列，兩人建立密切的合作關係，她的表現深獲道格拉斯的賞識。泰瑞爾曾陪著道格拉斯到白宮會見哈里遜總統 (Benjamin Harrison, 1833-1901)，要求總統在國會咨文中表態反對南方白人社會對黑人施以私刑 (lynching)；直到道格拉斯過世前，泰瑞爾有許多次機會陪同道格拉斯深入南方黑人貧民區，親身體驗

---

<sup>18</sup> 道格拉斯是內戰時期的黑人領袖，主張廢奴。內戰後，道格拉斯繼續爭取黑人民權不遺餘力。

種族隔離政策下黑人所受到的種種不公平待遇 (M. C. Terrell, 1953: 76-77; 1980: 410)。這些經歷都更堅定她爭取種族平等的立場。

這些堅持在她的婚姻生活中卻有了改變。泰瑞爾在面對她的同學兼好友庫柏 (Anna Julia Cooper, 1858-1964) 事件的態度反映出她爲了避嫌所採取的低調、妥協。泰瑞爾與庫柏相識甚久，兩人不僅是歐柏林學院的同班好友，畢業後又都定居華盛頓特區，先後在M街高中工作。庫柏在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六年之間擔任M街高中校長，規劃有關學術訓練方面的課程 (academic courses)，希望教育更多優秀黑人學生進入大學就讀。庫柏力主黑人應該接受通識教育 (liberal education) 的理念與泰瑞爾對於黑人教育的看法不謀而合。可惜庫柏的努力受制於華辛頓。華辛頓向來主張黑人教育應該以技職教育爲主，先求經濟上的穩定，才可能被白人社會接受 (Washington, 1895)。庫柏的作法與華辛頓的教育理念背道而馳。於是華辛頓向學校施壓，對外誣陷她與其養子拉福 (John Love) 之間有不正常的關係。最後校方以其行政能力不佳爲由，要求她卸下校長之職。庫柏被迫離開學校，遠至密蘇里州工作。<sup>19</sup>

泰瑞爾對於庫柏的處境採取冷漠態度。如果我們對照當時其夫的處境，或可尋得答案。一九〇一年，羅伯泰瑞爾正在等待華辛頓支持他擔任哥倫比亞特區學校董事會董事 (District of Columbia's school board) 的職務；<sup>20</sup> 一九〇二年，羅伯泰瑞爾希望獲得華辛

<sup>19</sup> 在有關M街高中的校史中，我們可以發現即使庫柏終身致力於教育，有關庫柏的事蹟報導並不多，可能與這件事有關。

<sup>20</sup> 福詮 (Timothy Thomas Fortune, 1856-1928)、湯普森 (Richard W. Thompson, 1809-1900) 在信中推薦羅伯泰瑞爾擔任哥倫比亞學校董事會董事一職，除了眾望所歸、心繫社區福祉外，他還具備其他如年輕、充滿朝氣、勇於創新、受過良好的教育，以及善於協調 (good "mixer") 等優勢。杜包斯 (W. E. B. DuBois,

頓提名，爭取華盛頓特區聯邦法官一職；<sup>21</sup> 一九〇六年，羅伯泰瑞爾腹背受敵，華辛頓質疑他的忠誠，同僚攻訐他，外界過度渲染他與華辛頓的關係，這種種狀況讓他備受困擾 (Washington, 1972-1989, vol. 5: 461-463; vol. 6: 266-267, 291-292, 314-315; vol. 8: 126-127, 561, 574-575; vol. 10: 74; vol. 13: 519)。羅伯泰瑞爾曾向華辛頓報告他在哈渥大學董事會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Howard University) 中所受到的待遇，除了一些莫須有的指控外，反對華辛頓的人用嚴格的法令審查華辛頓推派的人選。羅伯泰瑞爾認為他們將他歸類為華辛頓的人馬，才會動輒得咎 (Washington, 1972-1989, vol. 10: 341)。

在面對私領域或涉及個人紛擾時，泰瑞爾以維護丈夫的政治前途為優先考量，「女性應該全力協助男性進入政治圈」(B. W. Jones, 1990: 53; Welter, 1976: 154)，因此泰瑞爾對於自己經歷職場上的種族歧視也選擇隱忍以對。一九一七年八月她到戰時保險局 (War Risk Insurance Bureau) 擔任會計工作，該部門主管事先並不知道她是黑人，將她安排與白人同事共用辦公室，但知道她是黑人後，旋即將她解雇。泰瑞爾有權向法院提出申訴，但她卻保持緘默，因為當時羅伯泰瑞爾正在尋求威爾遜總統 (Thomas Woodrow Wilson, 1856-1924) 的支持，爭取華盛頓特區聯邦法官一職的連任。羅伯

---

1868-1963) 雖也是理想的人選，但他並不受歡迎。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湯普森也指出羅伯泰瑞爾個性內斂，但難免會得罪他人，他比較擔心的是羅伯泰瑞爾必須承擔其妻 (泰瑞爾) 在外言行所招致的敵人 (Washington, 1972-1989, vol. 5: 461-463, 465)。

<sup>21</sup> 華辛頓在寫給諾克斯 (Philander Chase Knox) 的信中列舉六名預備給老羅斯福總統提名聯邦法官的名單分別是：羅森 (Jesse Lawson)、羅伯泰瑞爾、史密斯 (Reuben S. Smith)、邦迪 (Joseph H. Bundy)、史都華 (Joseph H. Stewart)、培騰 (Fountain Peyton)。羅森是華辛頓的首選，羅伯泰瑞爾居次 (Washington, 1972-1989, vol. 6: 266-267)。



泰瑞爾是華盛頓特區中唯一的黑人法官，他的連任與否具有象徵性的意義，而他的提名需要白人與黑人的共同支持，此時泰瑞爾更不願節外生枝，「我相信身為一個妻子沒有權利因為自己的言行而阻礙丈夫的前途」(M. C. Terrell, 1980: 256, 262)。<sup>22</sup> 羅伯泰瑞爾的處境紛紛擾擾，泰瑞爾更謹言慎行，無論是親身經驗職場上的種族歧視，或他者，如好友庫柏蒙受蜚短流長之際，泰瑞爾都沒有據理力爭、挺身相助，就是最有力的證明。

## 肆、面對黑人社會——一切以種族優先

### 一、泰瑞爾與華辛頓的教育理念之爭

在與白人社會名流交往的過程中，泰瑞爾的身分是羅伯泰瑞爾的太太，稱職的泰瑞爾夫人。顧及先生的立場，她願意隱忍個人委屈。但在黑人社會中，她是黑人社會成員的一分子，面對與種族發展有關的爭議時，泰瑞爾採取截然不同的態度。她以「愛管閒事的人」(meddler) 自居 (M. C. Terrell, 1905, 566)，<sup>23</sup> 從種族的角度衡量事情，據理力爭，她和華辛頓之間為黑人教育理念之爭論就是例證。

一八九五年，華辛頓在「棉花州和國際博覽會」(Cotton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中發表演說，公開主張種族議題應該

<sup>22</sup> 一九一七年，羅伯泰瑞爾爭取連任的人事案備受攻訐，其中密西西比州參議員凡達曼 (James K. Vadamán) 反對立場最為強硬，他質疑羅伯泰瑞爾的品德，並暗示這項人事任命案將會造成更多白人女性受到強暴的迫害，羅伯泰瑞爾更被醜化成猩猩、猴子、狒狒等。泰瑞爾認為這些不實的人身攻擊全是種族的緣故，完全漠視了黑人合法的權益。

<sup>23</sup> 泰瑞爾認為一個負責、活躍、無懼、堅持原則的「愛管閒事的人」，應該從制度、法律、習俗等層面去了解造成人們不幸的原因，而她自己被稱為「愛管閒事的人」是當之無愧。

採取妥協的立場。他的保守觀點深受白人政客青睞，讓他成為白人眼中可以取代道格拉斯的新黑人領袖；麥金萊總統 (William McKinley, 1843-1901) 親訪華辛頓一手創辦的塔斯各濟學校，公開盛讚華辛頓的成就；一九〇一年，老羅斯福總統力排眾議，在白宮宴請華辛頓。華辛頓也將大部分的時間放在巡迴演說上，宣揚黑人應該服務白人的理念，批評那些主張社會公平 (social equality) 的黑人領袖為政治上的激進分子 (political extremists)。一九〇〇年，華辛頓爭取擔任「全國黑人商業聯盟」(National Negro Business League) 董事會主席一職，他的任務就是確保商業議題為該組織關心的唯一選項，避免爭議性的黑人民權問題。對華辛頓而言，黑人有機會賺錢謀生、有屬於自己的資產，遠比有投票權重要。

華辛頓不僅是白人社會力圖形塑的黑人領袖，也成為授與資源 (無論權力或資金) 的主要黑人對象。華辛頓幫也逐漸成形，它分配黑人政治權力，向老羅斯福總統提供非裔候選人名單，爭取政府職缺。一九〇一年，羅伯泰瑞爾在「華辛頓幫」成員福詮 (Timothy Thomas Fortune, 1856-1928)、湯普森 (Richard W. Thompson, 1809-1900)、瑪克金賴 (Whitefield Mckinlay, 1857-1941) 等人的推薦下進入政壇 (Washington, 1972-1989, vol. 5: 459-460, 461-463; vol. 6: 291-292, 318-319)。羅伯泰瑞爾對於華辛頓感激之情溢於言表，時時護衛華辛頓；當來自芝加哥的律師莫瑞斯 (Edward Morris) 譏諷華辛頓是騙子和背叛者時，羅伯泰瑞爾挺身而出為其辯護；當許多黑人質疑華辛頓繼續與老羅斯福總統保持友善關係是否合宜時，羅伯泰瑞爾撰文替老羅斯福總統辯解，宣稱他是「人權的鬥士」(a champion of human rights) (R. H. Terrell, 1904: 543; Washington, 1972-1989, vol. 7: 391-392)。

相對於羅伯泰瑞爾對華辛頓的感恩，泰瑞爾有不同的看法。泰

瑞爾深知是華辛頓力挺，羅伯泰瑞爾才有機會出任法官一職，但她知道如果沒有其他白人的首肯，也不可能成就羅伯泰瑞爾 (M. C. Terrell, 1980: 192-194)。<sup>24</sup> 所以泰瑞爾並不像羅伯泰瑞爾一樣感念華辛頓。泰瑞爾支持杜包斯 (W. E. B. DuBois, 1868-1963)<sup>25</sup> 對於種族議題的看法，認同「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的創會精神，因顧慮羅伯泰瑞爾的立場，該組織於一九〇九年成立時，她只有簽名支持，並沒有實際參與任何活動，但此舉卻被華辛頓幫解釋為對華辛頓權威的挑戰。

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初期成員包括露芬·亞當斯 (Jane Addams, 1860-1935)、米賀藍 (Inez Milholland)、杜包斯、達若 (Charles Darrow)、盧梭 (Charles Edward Russell)、史蒂芬斯 (Lincoln Steffens)、貝克 (Ray Stannard Baker)、威爾斯巴奈特等，他們公開反對美國政府的種族政策，積極爭取黑人政治權力，和華辛頓面對種族議題採取的妥協立場及黑人經濟問題優先於政治權利的看法迥異。華辛頓對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持負面的評價，指責他們並沒有考慮黑人的立場，欺騙黑人，讓黑人大眾相信透過要求 (making

<sup>24</sup> 泰瑞爾的觀察是正確的，羅伯泰瑞爾的人事案獲得多數人的支持與肯定，其中不乏南方的白人律師與議員 (Washington, 1972-1989, vol. 6: 318-319; vol. 9: 337-338; vol. 10: 43; vol. 12: 169-170, 437; vol. 13: 13)。

<sup>25</sup> 杜包斯是美國第一位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的黑人學者，一八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他和華辛頓在種族議題上的看法迥異。他認為黑人種族提昇，應該重視黑人民權。杜包斯參加尼加拉瓜運動 (Niagara Movement)，採取較為激烈的手段面對白人的打壓。一九〇九年成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並在該組織的刊物《危機》(The Crisis) 中發表他對於私刑、種族隔離政策、性別不平等的看法。他也支持美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希望黑人可以藉此獲得公平的對待。一九三〇年代經濟大恐慌加速惡化黑人的處境，他開始從馬克斯主義的角度來解釋種族的問題，相信資本主義無助於改革，並於一九六一年加入共產黨。

demands)、推動決議案 (passing resolution)、或詛咒他人 (cursing somebody) 就可以如願獲得種族平等與權益，並表示全國沒有人比他 (華辛頓) 更了解黑人所受的不平等待遇 (Washington, 1972-1989, vol. 10: 333-334, 334; vol. 11: 52)。

其實泰瑞爾早就不滿華辛頓對於黑人教育的作法，庫柏的人事問題因為涉及她們之間的私誼，泰瑞爾不願表態。但教育是攸關種族未來發展大計，牽涉的層面廣，茲事體大，泰瑞爾無法置身事外。華辛頓主張黑人應該以接受職業教育為主，協助黑人先具有就業謀生的能力，在經濟穩定的情況下，白人社會才會同意黑人享有公民權利。泰瑞爾卻認為高等教育與職業訓練並不抵觸，可以雙管齊下，不應該一開始就將這些學習項目摒除在外，讓黑人永遠成為次等公民 (1980: 191)。

一九〇五年二月十九日，泰瑞爾在一場演講中強烈抨擊華辛頓的教育理念，質疑華辛頓不讓黑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動機 (B. W. Jones, 1990: 44)。此舉引起不同的反應。在泰瑞爾前往紐約發表演說之前，華辛頓就已經向羅伯泰瑞爾暗示他個人希望泰瑞爾夫人在演說上採取較為保守的態度。泰瑞爾的朋友要她不要說的太嚴厲，泰瑞爾卻認為說出事實真相，是忠於自己與種族的表現 (Washington, 1972-1989, vol. 8: 526)。華辛頓幫對泰瑞爾的發言深表不滿，紛紛向華辛頓進言。安德森 (Charles W. Anderson) 建議華辛頓，「是該好好罵罵這個女人的時候了」(1906)；有人認為泰瑞爾必須閉嘴，因為黑人需要的是可以提出建設性意見的人，而非煽動群眾的人 (Chittenden, 1975; Meier, 1963; Shepperd, 1959; M. C. Terrell, 1904, 1980)。反對華辛頓幫者則將泰瑞爾視為英雄人物，譬如前白人參議員馬漢尼 (Rowland B. Mahany) 就多次在公開場合中推崇泰瑞爾，建議黑人男性應該向泰瑞爾多學習 (Washington,

1972-1989, vol. 8: 540)。

一九〇五年之後華辛頓開始對泰瑞爾在公開場合中的言行採取敵視與懷疑的態度。一九〇六年八月，泰瑞爾與「憲法聯盟」(Constitutional League) 合作，向老羅斯福總統請願，希望讓三位被控參與德州種族暴動 (Brownsville, Texas riot)<sup>26</sup> 的士兵復職，泰瑞爾並撰文〈明哥桑德斯之素描〉(“A Sketch of Mingo Saunders”) 申述己見。華辛頓認定泰瑞爾此舉是在向他抗議。<sup>27</sup> 華辛頓派人跟蹤泰瑞爾的公開行程，在一封機密信函中，安德森詳細記錄泰瑞爾在紐約市的行蹤，也向華辛頓報告泰瑞爾在珍珠山教堂 (Mount Olivet Church) 的演說內容，說泰瑞爾強烈批判華辛頓是在向白人輸誠，承認黑人確實不如白人，讓黑人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Washington, 1972-1989, vol. 13: 519)。

一九〇九年泰瑞爾友情贊助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後，她與華辛頓之間的緊張關係浮上檯面。在一封列為機密的文件中，根據密探回報的消息，華辛頓去函羅伯泰瑞爾，質疑為何泰瑞爾的名字會出現在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會議名單中，並表示這會造成他很大的困擾，「當然，我並不想控制任何人的行為或意志，但我要讓他們

<sup>26</sup> 史家稱之為「布朗斯維爾事件」(Brownsville Affair)。事情發生在一九〇六年八月十三號，因為一場誤會所引發的槍戰，一名白人士兵死亡，一名警察受傷。論及責任歸屬時，白人士兵宣稱是黑人士兵挑釁發動的。老羅斯福總統接受白人方面的證詞，逮捕 167 名黑人，在沒有任何公開聽證會的情況下，以企圖叛國起訴，其中有些黑人甚至因此損失了退休金。這件事情引起黑人社會極大的憤怒。華辛頓對於老羅斯福總統的處置方式不滿，但從未公開批評。這個事件一直到一九七〇年代才獲得平反。相關資料可參考 Lane (1971)。

<sup>27</sup> 華辛頓與老羅斯福總統私交甚篤，不過為了進一步取得總統的信任，華辛頓不止一次的向其幕僚表示他會全力支持老羅斯福總統的人事案，不會出面干涉。這對他個人或種族都極為有利 (Washington, 1972-1989, vol. 6: 291-292, 406; vol. 8: 130, 542; vol. 9: 454-455)。

知道我們的立場」。「這個團體（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在去年這段期間內對於總統和我們的朋友都造成很大的傷害，繼續下去的話，我們想要幫你也難」。「想想看，你的朋友也許今天代表你去白宮晉見總統，幾天後卻見到泰瑞爾夫人發表指責總統的言論。這會讓我們十分難堪」（M. C. Terrell, 1980: 193-194; Washington, 1972-1989, vol. 10: 323）。

在這些爭議中，羅伯泰瑞爾自始即採取觀望態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當泰瑞爾成為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創始成員後，朋友們擔心會成為羅伯泰瑞爾未來政治生涯的絆腳石，他則表示支持，並告訴他的朋友「我的太太正在指導總統如何治國」（Chittenden, 1975: 351）。言下之意，羅伯泰瑞爾頗以其妻之表現為傲。羅伯泰瑞爾的觀望態度引起華辛頓支持者的不滿。一位華辛頓的支持者投書給華辛頓，聲稱他已經受不了羅伯泰瑞爾的偽善，指責他忘恩負義，因為「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們能有今天都是仰賴華辛頓的提攜，而非靠自己的能力。」史考特（Emmett Jay Scott, 1873-1957）<sup>28</sup>特別在這封信中附上便條紙指示進行調查（Washington, 1972-1989, vol. 11: 103）。泰勒（Ralph Waldo Tyler, 1859-1921）去函華辛頓表示不要對《蜂報》（*The Bee*）抱太多的期望，因為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勢力已經侵入，有的朋友參加並贊助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成了背叛者。他並暗指羅伯泰瑞爾雖沒有實際捐錢，但他已經承諾會有所行動，在他（泰勒）眼中，羅伯泰瑞爾不折不扣是機會主義者，因時因地隨時轉變立場與態度（Washington, 1972-1989, vol. 12: 87-88; vol. 13: 43）。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史考特去函華辛頓表示，面對險惡的局勢，華辛頓必須要羅伯泰瑞爾等人閉嘴，不再發表相關言論

<sup>28</sup> 史考特是華辛頓的貼身秘書與得力助手，也是華辛頓幫重要領導人物之一。他熟悉大眾傳媒的操作，華辛頓的理念就是靠他的運作與協助傳遞出去。

(Washington, 1972-1989, vol. 12: 93)。華辛頓在這件事情上並沒有照慣例依循史考特的建議去做，反而在一九一三年四月寫信給羅伯泰瑞爾，讚許他很有自己的想法 (Washington, 1972-1989, vol. 12: 169-170)。

資料顯示基於現實的考量，華辛頓決定與羅伯泰瑞爾維持表面上的和諧。當時兩人的政治實力互有消長，華辛頓的聲勢已不如前，而羅伯泰瑞爾表現深獲各方人士支持；以杜包斯為首的黑人新勢力正在侵蝕華辛頓既有的權力基礎，許多華辛頓的舊識或支持者，如賀爾 (George Cleveland Hall)、<sup>29</sup> 強森 (James Weldon Johnson, 1871-1983)、<sup>30</sup> 路易斯 (William Henry Lewis)、<sup>31</sup> 摩頓 (Robert Russa Moton, 1867-1947)<sup>32</sup> 等都紛紛轉向投靠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華辛頓需要的是更多奧援，而非樹立新敵人。事實上，華辛頓對於羅伯泰瑞爾此次爭取華盛頓特區聯邦法官連任的人事案的影響力已經十分有限，早在一九一四年二月初威爾遜總統就已經直接接見羅伯泰瑞爾，表示無論是書面或口頭的推薦，大家都給予羅伯泰瑞爾一致好評，令他印象深刻 (Washington, 1972-1989,

<sup>29</sup> 賀爾是華辛頓的醫生，也是他的好友，但他也是「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草創時期的重要人物。

<sup>30</sup> 強森在一九〇〇年譜寫一曲“Lift Every Voice and Sing”，該曲後被視為黑人的國歌 (The Negro National Anthem)。在華辛頓的影響下，強森拒絕加入「尼加拉瓜運動」。華辛頓和安德森為了獎勵他的忠誠，向國務院施壓，讓他成為美國外派委內瑞拉 (Venezuela, 1906-1908)、尼加拉瓜 (Nicaragua, 1909-1912) 的官員，但安插其在歐洲任職的努力卻失敗。當威爾遜總統上任後，他辭去官職，加入「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

<sup>31</sup> 路易斯一向支持與「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合作的事情 (Washington, 1972-1989, vol. 11: 53)。

<sup>32</sup> 摩頓去函華辛頓表示雖然他參加「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但他永遠和華辛頓站在同一陣線，參加「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只是希望能夠幫助他們完成既定的目標。但後來他發現，這些目標恐怕無法實現 (Washington, 1972-1989, vol. 11: 6-8)。

vol. 12: 437)。

羅伯泰瑞爾雖與華辛頓關係密切，但泰瑞爾在黑人社會中對種族議題不妥協的立場有效地化解了來自反華辛頓或其他激進派黑人的阻力。而根據拉蒙特 (Charles Lemert) 的研究指出，一九一〇年之後，華辛頓的權勢逐漸衰退，杜包斯逐漸成為黑人知識分子的領導人，泰瑞爾夫婦的立場遂「順利」移轉杜包斯陣營 (1998: 23)。因此泰瑞爾與杜包斯保持良好關係，對羅伯泰瑞爾在黑人社會地位的影響是正面的。

## 二、以種族之名，羅伯泰瑞爾鼓勵泰瑞爾參與公領域活動

泰瑞爾和其他黑人領袖，如：道格拉斯、圖斯 (Sojourner Truth, 1797-1883)、圖伯曼 (Harriet Tubman, 1820-1913)、貝舒、亨利 (John Henry)、葛爾衛 (Marcus Garvey, 1887-1940) 等一樣，擅用演說的力量，凝聚種族共識，傳遞信念。

羅伯泰瑞爾則是泰瑞爾成為演說家的幕後推手，他鼓勵泰瑞爾用公開演說的方式作為參與公領域的途徑，為爭取黑人權益盡些心力，並引薦諾斯 (Robert Nourse，著名的演說家，來自美國西維吉尼亞州) 教導泰瑞爾演說的技巧，朝向成為演說家的方向發展。此舉引起羅伯泰瑞爾朋友們的擔心，並提出警告，認為一旦女人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並以此發展成為個人事業，將是災難的開始，禍及家庭幸福。他們建議羅伯泰瑞爾要懸崖勒馬，避免造成無法彌補的錯誤，他卻堅信透過演說感動聽眾是爭取種族權益的不二法門。泰瑞爾自己也承認，「羅伯泰瑞爾不只鼓勵，甚至有點強迫性的要我接受第一次公開演說的邀約」(1980: 157-158)。羅伯泰瑞爾以泰瑞爾在台上的表現為榮 (M. C. Terrell, 1977: 779, 783-2, 792-1, 801,



803)。

在諾斯的訓練下，泰瑞爾成爲知名演說家。除了國內各種演講邀約外，也發表過三次國際性的演說。一九〇四年，代表美國黑人女性參加在德國柏林舉辦的國際婦女會議(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Women)；<sup>33</sup> 一九一九年，受邀參加「爲自由和平之婦女國際聯盟」(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 在蘇黎世舉辦的會議，並擔任主持人；一九三七年，在倫敦舉辦的「世界伙伴共同信仰國際大會」(International Assembly of the World Fellowship of Faith) 中發表演說。特別是在國際婦女會議中卓越的表現讓泰瑞爾一舉成名。

在國際婦女會議中，泰瑞爾是唯一的黑人女性，柏林媒體積極爭取獨家頭條報導。泰瑞爾深知外界對於黑人好奇，所知甚少，希望藉此機會提供充分的資訊，猶豫要用何種語文表現。羅伯泰瑞爾認爲英文是最佳的表達工具，泰瑞爾再三考慮，決定捨棄原先準備好的英文稿，改以流利的德文發表演說，闡述黑人與女性應該享有的平權。聽眾報以熱烈的掌聲，德國、法國、澳洲、挪威等國家的報紙爭相邀稿。這些反應都讓泰瑞爾更加認同羅伯泰瑞爾的想法，演說方式確實是讓海外充分了解美國境內種族問題的最佳方式 (M. C. Terrell, 1980: 197-201, 204)。

一九一九年五月，爲自由和平之婦女國際聯盟在蘇黎世召開第二屆年會，該組織在美國的分會原本推派三十名代表參與，但美國政府卻只願核發十五張簽證。泰瑞爾在其回憶錄中表示，能夠成爲唯一的黑人女性代表，深覺責任重大 (1980: 330-332)。羅伯泰瑞爾不僅全力支持，也對泰瑞爾的蘇黎世之行寄予厚望，希望透過泰

<sup>33</sup> 這趟德國之行泰瑞爾也得到雙親的協助與祝福；母親願意協助照料幼女，父親贊助三百元旅費 (M. C. Terrell, 1980: 197)。

瑞爾之口，讓全世界知道美國黑人的處境與需求 (M. C. Terrell, 1977: 803)。<sup>34</sup> 這次泰瑞爾又以流暢的德文完成這項任務。泰瑞爾非常滿意自己的表現，用長達六頁的家書與家人分享了她的興奮之情 (1977: 809-2, 810)。事實上，當她向為自由和平之婦女國際聯盟美國分會主席亞當斯 (Jane Addams) 表示要用德文發表演說時，亞當斯也露出驚訝的表情 (1977: 808-802)。因種族之名，羅伯泰瑞爾鼓勵泰瑞爾在演講台上為爭取種族權益而努力，也因此在此公領域的活動中，常見泰瑞爾活躍的身影。

羅伯泰瑞爾反對其妻投入政治活動，雖然泰瑞爾常抱怨其夫待她如同「易碎的玻璃，時時刻刻需要保護」，但她仍尊重羅伯泰瑞爾的意見 (1980: 167)。和泰瑞爾同時期的重要黑人女性，如：布朗 (Charlotte Hawkins Brown, 1883-1961) 是一九二〇年代南方種族活動中的活躍分子；伯朗 (Hallie Q. Brown, 1859-1949) 則是積極投入禁酒運動 (Temperance Movement)；塔伯特 (Mary Burnett Talbert, 1866-1923) 致力於反私刑的活動；貝舒致力於爭取黑人平等與性別平等，主張黑人女性應該進入政壇，提升黑人族群的地位。相形之下，泰瑞爾是較少出現在類似議題或場合的。

但在協助種族之名下，羅伯泰瑞爾同意讓泰瑞爾參與一些政黨輔選幕後的活動，特別是在總統大選中協助共和黨爭取黑人選票。黑人一向支持共和黨，可是共和黨卻無法有效解決他們在經濟上一直處於弱勢的問題，黑人選民在失望之餘紛紛離開共和黨。一九二四年總統大選，許多黑人選民轉而支持民主黨候選人戴維斯 (John W. Davis, 1873-1955) 或進步黨 (Progressive Party) 候選人拉法業

---

<sup>34</sup> 不僅羅伯泰瑞爾支持，泰瑞爾的母親也極力支持她。有一次她受邀演說，但必須離家三個星期，母親立即願意在這段期間內替她照顧家庭，力促她把握機會 (M. C. Terrell, 1980: 159)。

特 (Robert La Follette, 1855-1925)，因為他們都承諾當選後會平等對待所有的美國公民。一九二八年，共和黨公開向南方白人選民示好，激怒更多黑人選民離開共和黨。

當黑人紛紛避走共和黨，投效支持其他政黨陣營之際，泰瑞爾依然是忠貞的共和黨員，並為共和黨總統大選戮力輔選 (Chittenden, 1975; Meier, 1963: 239-241; Shepperd, 1959; M. C. Terrell, 1904, 1980)。泰瑞爾的著眼點除了關心其夫的仕途外，也考量種族在政壇發展的機會；相對於民主黨，共和黨對於黑人的態度友善許多，願意晉用黑人擔任公職。一九三二年，在為胡佛競選連任的過程中，許多黑人包括藍森 (Reverdy C. Ransom)、華頓 (Lester A. Walton) 等都批評胡佛所提出的重建金融計畫 (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 是在保護白人企業家。但泰瑞爾表明支持胡佛的立場，因為「有許多與黑人權利相關的政策和法案都是由共和黨提出的」(B. W. Jones, 1990: 58-59)。

## 伍、種族因素對黑人女性活動的影響與意義

### 一、種族因素改變黑人女性活動空間的區隔

卡爾頌提出「黑人女性的維多利亞特質」不僅為黑人女性涉足公領域的行為提出合理的解釋，超越了貝克所提出的政治家務化論述。在政治家務化論述下，模糊公、私領域的界線，擴大女性活動範圍。但從心態上來看，女性仍界定自己為家庭主婦的角色，不去挑戰女性與「家」、「家務事」之間的傳統關係。她們從母親的角色，以關懷、捍衛家庭為由，走出家庭，要求政府回應她們所關切的問題。

黑人社會鼓勵黑人女性積極參與社區活動，不僅是為了「家」，

也著眼於種族存續與提升種族社會、經濟與政治地位 (B. W. Jones, 1990: 69)。黑人社群樂於接受女性兼顧公領域活動與私領域家庭的生活模式，杜包斯公開表示黑人女性在公領域的活動並不違反女性特質，每個人都要為提昇種族而努力 (Cooper, 1988; W. E. B. DuBois, 1975)。在本研究中，泰瑞爾在參與公領域活動，為提昇種族而努力時，並沒有忽略她在私領域的責任。種族因素讓黑人女性必須和黑人男性共同面對種族問題的挑戰。相對於白人女性，她們反而有更大的活動空間，提昇種族的責任讓她們堂而皇之進入公領域的活動範疇。我們在泰瑞爾的研究中也獲得證實。不僅如此，種族因素也豐富了黑人女性關心的議題，舉凡與種族相關的問題，從政治、經濟、文化，到人權、外交，都可以是她們關注的焦點。

本論文討論時間 (一八九一至一九二五年) 與美國進步時期相當，史家視進步時期的女性活動歸為女性主義活動的一環，爭取女權是主要特徵，也有史家將泰瑞爾視為女性主義者，認為她的活動是爭取黑人女權的一環 (Sterling, 1979: 17-31)。但本研究的結果顯示，泰瑞爾在面對白人社會時，謹守白人社會對於女性的期待，扮演好相夫教子的角色。但在公領域的活動中，她和黑人男性一樣，為爭取黑人平權而努力。在與華辛頓的教育理念之爭論中，都是以黑人最大福祉為取向，非以性別為依歸；而鼓吹女性接受教育的目的也是為服務黑人社會。若因此視泰瑞爾為女性主義者是不恰當的，她並沒有將性別平等視為優先考量。

我們該如何稱呼這個時代的黑人女性？學者沃克 (Alice Walker) 和漢恩用黑人女性主義者 (womanist)、黑人女性主義 (womanism) 形容這個時代的黑人女性，區別她們與白人女性主義者 (feminist) 和女性主義 (feminism) 的不同。黑人女性主義是指黑人女性因為同時深受種族、性別、階級等等的不公平待遇，她們爭

取的是作為一個人和公民應有的權益，而非專注於性別上的不平等。史家伯朗 (Elsa Barkley Brown) 也認同這樣的說法。<sup>35</sup> 史家韓蓼 (Joyce A. Hanson) 用以具有黑人女性主義意識的種族女性 (race woman with a womanist consciousness) 形容貝舒 (2003: 96)，筆者認為用於泰瑞爾身上亦貼切。泰瑞爾認為黑人女性是「我們種族的母親、妻子與姊妹 (the mothers, wives, daughters, and sisters of our race)」，「黑人女性要組織起來幫助黑人族群」(B. W. Jones, 1982b)。對泰瑞爾而言，爭取社會公平正義，提昇種族的社會地位與福祉，才是她參與公領域活動的終極目標。

事實上，由於黑人社會對於黑人女性的期待，讓黑人女性免於在面對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之間必須有所抉擇的困境。她們是種族的女性，無論性別或種族議題都是她們的努力目標，不需要做任何取捨 (Ryan, 1983: 198-210)。<sup>36</sup> 因此從議題的角度來看，種族因素確實擴大了黑人女性可以參與、討論、採取行動的彈性與廣度。

## 二、種族因素影響黑人女性面對白人文化的態度

在種族因素影響下，黑人女性的維多利亞特質反映出黑人女性在面對白人文化時的困境。對於黑人女性而言，膚色是她們的原罪，因為種族因素受到的屈辱更甚於因性別因素而產生的迫害。她們是黑人社會的成員，也想成為美國社會的一員。但美國社會中，男性為首，女性居次，女性中又以白人女性為優，黑人女性為低。黑人女性深知要獲得白人社會平等對待的先決條件是白人女性接

<sup>35</sup> 有關“womanism”的論述可以參考Brown (1989: 630-633); Hine (1996); Walker (1983); Ogunyemi (1985)。

<sup>36</sup> 哈列則認為這個策略是在合理化黑人女性活動者在公共領域中的活動 (Harley, 1982: 256)。

納黑人女性，她們必須學習白人女性特質的規範，至少在行為表現上能夠類似白人女性的作為，對中產階級黑人女性而言更為重要 (Frazier, 1974: 39; Higginbotham, 1993; J. Jones, 1980)。

黑人女性活躍於社團組織，有的也是為了表現她們和白人女性一樣。如全國黑人女性聯盟，該組織的創始會員多為中產階級，如：威爾斯巴奈特、露芬、泰瑞爾等，她們都承認是受到白人女性社團組織的刺激；露芬鼓勵黑人女性用行動證明她們可以和白人女性一樣，「我們的目標和興趣和那些行為舉止優雅的白人女性一樣」；「婦女紀元俱樂部」(Woman's Era Club) 在波士頓召開全國性會議，《婦女紀元》(*Woman's Era*) 在一八九五年十月號中指出：「這是美國史上的第一次，可以看到數以百計的黑人女性盛裝參與會議，正如白人女性一般」(Lerner, 1974: 161; Ruffin, 1933: 18; M. C. Terrell, 1990c: 322; Wesley, 1984: 57-59)。

在本個案研究中，我們確實看到泰瑞爾為滿足白人社會對於女性的要求所做的努力，做一個讓白人社會可以認同的黑人女性。她實踐白人女性的特質，謹守女性照顧家庭的天職，處處以夫為尊，以期符合白人社會對於女性的期待。但是，泰瑞爾是黑人，為什麼要遵守白人對於女性的規範？為什麼表現出道德上的純潔是如此重要？史家哈列認為黑人中產階級在整個黑人人口中是少數中的少數，因為種族歧視之故，工作或收入並不是決定階級的必要因素，對於黑人女性而言，禮儀、行為端莊、人格高尚以及道德上的完美在決定社會階級時更為重要 (Barnett, 1997; Harley, 1993: 786-789)。泰瑞爾相信只要證明黑人女性無異於白人女性，就可以跨越社會階級、種族的障礙 (E. C. DuBois, 1991; McCluskey, 1999: 2, 3, 48)。

不過，泰瑞爾深知白人社會都是以種族整體表現來評斷黑人或

黑人女性，所以她協助其他黑人姊妹，因為社會地位不高，教育水平低的一般黑人女性「在行為上容易犯錯，讓種族和其個人都蒙羞」(1905: 567)。任何一個對於黑人女性的指責，將會被引用在所有的黑人女性身上，「這個世界通常會以多數女性的行為，來判斷這個種族的女性特質」(M. C. Terrell, 1990b)。泰瑞爾的想法也顯示中產階級黑人女性為免於受到波及，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協助低社會階級的黑人女性，「沒有比和我們的女性更靠近更好的辦法了，即使我們想要遠離她們，和她們撇清關係，我們也沒有辦法逃脫她們行為上所帶來的結果」(M. C. Terrell, 1990b: 144)。對於這些中產階級的黑人女性而言，那些低社會階層的黑人女性是「(中產階級) 黑人女性的負擔」(“Black Woman’s Burden”) (B. W. Jones, 1990: 26)。顯然黑人中產階級女性努力克服種族種種的障礙時，仍然無法跨越階級上的偏見。

### 三、種族因素對於黑人兩性互動的影響

種族因素影響黑人女性的活動空間，黑人男性也必須支持她們，給予必要的協助，進而改變兩性關係的相處。這是貝克的政治家務化的論述或卡爾頌的「黑人女性的維多利亞特質」都沒有提及的。筆者認為無論研究的主體是女性或男性，偏重任何一方的研究，都無法完整呈現兩性的互動關係。本研究發現種族因素不只讓黑人女性有更多的發展空間，也彌合了黑人兩性之間因為活動空間調整而產生的間隙。

在泰瑞爾與羅伯泰瑞爾的互動中，她處處謹守私領域行為的規範，實踐社會對於女性的期望，強調「家庭」對女性的重要，想成為稱職的妻子與母親 (Broussard, 2002: 25; M. C. Terrell, 1990a: 137)。在她擔任全國黑人女性聯盟董事會主席任期間 (1895-

1901)，泰瑞爾揭櫫全國黑人女性聯盟的首要目標是在「家庭」，「相信家庭與培養好品德黑人之間的必然性，全國黑人女性聯盟的責任就是在樹立正確的觀念，糾正生活上的壞習慣，淨化家庭，創造良好的生活環境」(1990a: 135)。對於一個善良、誠實的黑人女性而言，「家」是她的首選 (M. C. Terrell, 1990b)。

在泰瑞爾與華辛頓的爭論中，羅伯泰瑞爾的態度十分重要。整起事件是對種族教育看法上的歧見，而非挑戰羅伯泰瑞爾的男性權威。有人警告羅伯泰瑞爾要注意，免得影響他與華辛頓之間的關係，不利政途發展。但羅伯泰瑞爾認為這是為了種族永續發展，如果因此而影響到他的政治生命，他寧可不要 (M. C. Terrell, 1980: 194)。這段話出自泰瑞爾的自傳中，顯然她是在引用羅伯泰瑞爾的話，合理化自己的行為，並無踰越女性角色的規範，亦無損羅伯泰瑞爾的男性權威。正如學者戴寧格 (Kirsten Dellinger) 的研究所言，當男性權威處於困境或遭受批評時，他們就會特別強調男女之別；反之，當他處於安全的情境，男性會彰顯自己與其他男性的不同，男女共同合作的空間反而增加 (2004: 556)。在公領域中，泰瑞爾相信黑人女性的活動是為服務家庭與種族。羅伯泰瑞爾在家庭(私領域)中的地位是處於安全、不受威脅的狀態，在公領域中，羅伯泰瑞爾信心十足，「沒有人像我一樣得到如此多的肯定」(M. C. Terrell, 1977: 783-782)。<sup>37</sup> 因此，對羅伯泰瑞爾而言，不需要刻意區分公、私領域之別，反而讓泰瑞爾有更大的活動空間。

其次，除了自己的主觀感受外，他人的看法也會影響兩性互動關係。學者康耐爾 (Robert W. Connell) 指出，不同的文化價值、信仰與實踐都會影響兩性在表現性別特質方面的正當性，關鍵因素

<sup>37</sup> 羅伯泰瑞爾再次獲得任命，去函謝謝華辛頓，並表示「我相信在某些方面我的表現並沒有讓你失望」(Washington, 1972-1989, vol. 10: 43)。



在於有多少人支持他們這樣的作法 (1987: 185)。偉司特 (Candace West) 也持同樣的看法，認為與他人之間的互動關係是影響認同行為表現的主因 (West & Zimmerman, 1987)。史家卡特 (Nancy F. Cott) 認為男性希望同時兼顧被同儕接受與展現自我的獨特性 (1990: 210)。從泰瑞爾與華辛頓爭論的例子中，我們看到羅伯泰瑞爾在面臨抉擇時的考量：如何支持泰瑞爾，同時獲得同儕的認同。以種族之名允許、鼓勵黑人女性參與公領域活動的觀念，在此就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婚前泰瑞爾就表明支持婦女投票權運動的立場，羅伯泰瑞爾大笑表示這將會毀掉她得到一位好丈夫的機會；泰瑞爾則回答，她不會傻到嫁給一位不相信女性有能力管理國家事務的男人 (1980: 144)。事實上，羅伯泰瑞爾不只支持婦女投票權運動，他也鼓勵黑人女性知識分子積極參與該運動，因為這是讓世人可以進一步了解黑人的最佳機會 (M. C. Terrell, 1977: 821-822)。羅伯泰瑞爾採取這個立場的出發點顯然是考量種族整體利益的結果。

種族因素是決定黑人女性參與公領域活動是否具有正當性的重要關鍵。無論是泰瑞爾參加公開演說或社團活動，全都是為全體黑人利益，羅伯泰瑞爾都採取尊重的態度。面對公開演說的邀約，泰瑞爾有所猶豫，羅伯泰瑞爾就會生氣，他認為：「當為數甚少的黑人女性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卻不知回報社會，那是一種恥辱」。泰瑞爾所以活躍於演說台上，羅伯泰瑞爾不斷的鼓勵居功厥偉 (M. C. Terrell, 1980: 158-159)。

當黑人女性在公領域的活動被賦予種族使命時，黑人男性沒有立場限制黑人女性只能在私領域活動，為了讓黑人女性無後顧之憂，黑人男性必須進入原本屬於女性的私領域。以泰瑞爾夫婦為例，當泰瑞爾四處巡迴演講，羅伯泰瑞爾就必須負擔起妻子不在家時的所有家務，包括照顧女兒、收發信件、整理花園等工作。在泰

瑞爾夫妻的通信手札中，清楚看到羅伯泰瑞爾持家的情形；泰瑞爾不止一次叮嚀羅伯泰瑞爾要如何教育兩個女兒，以及她對於女兒的期望，希望羅伯泰瑞爾在教育的過程中要謹守這些原則；羅伯泰瑞爾也會幫忙泰瑞爾處理信件，郵寄包裹，將她的絲巾送洗等等。羅伯泰瑞爾也會抱怨他一下班就必須趕回家，沒有辦法像其他同事一樣參加下班後的活動 (M. C. Terrell, 1977: 756-2, 765, 768, 792-1, 795)。在以種族發展為優先考量的情況下，黑人兩性的互動關係早已有所修正；泰瑞爾活躍於公領域，只為種族進步盡一份心力；羅伯泰瑞爾則願意進入私領域，分擔家務、照顧孩子，料理瑣事。

在本研究中也發現泰瑞爾夫妻互動中的角力。羅伯泰瑞爾運用自己對於泰瑞爾的影響力，鼓勵她從事演講的工作，重新創造 (re-create) 泰瑞爾，使之成為黑人社會中理想的黑人女性。對於泰瑞爾而言，她的行事依照黑人女性特質的規範進行。從表面上來看，羅伯泰瑞爾似乎掌握了所有的主導權，但在某些事情上泰瑞爾還是有所堅持。譬如在柏林的會議上決定用德文演說、參加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和華辛頓之間的論戰等，也說明了她在接受白人主流文化對於女性期望的同時，也因種族之名讓黑人女性在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模式中找到機會，自己決定她的行動方向。

## 陸、結論

史家卡爾頌以黑人女性的維多利亞特質，論述分析十九世紀末中產階級黑人女性參與公領域的活動。本文則以瑪麗泰瑞爾為個案研究，同時從她在公、私領域的活動，繼續探討該議題。白人的女性特質強調女性在私領域的角色，鼓勵男性負起應有的責任。但在種族歧視之下，這樣的期許在黑人社會中窒礙難行。卡爾頌在論述中加入種族因素後，合理化黑人女性在公領域的活動，亦無損於黑

人男性的男子氣概。於是中產階級黑人女性必須謹守白人社會對於女性行為的規範，也要為改善種族的社會地位而努力。

「黑人女性的維多利亞特質」論述中，白人的女性特質與種族因素是關鍵議題，本研究以瑪麗泰瑞爾為例，點出了黑人女性如何同時面對的性別與種族的困境。在面對白人社會時，泰瑞爾必須小心處理言行舉止，表現出賢妻良母的規範，深恐因為與個人相關的事情，如她的摯友庫柏的人事紛擾、自己在職場上被歧視的親身經驗，被白人社會用放大鏡去解讀，在關鍵時刻影響了羅伯泰瑞爾的仕途。但身為黑人社會的一員，基於女性對於提昇種族的責任，她關切任何一個影響種族未來發展的議題，並付諸行動。本研究結果也顯示，種族因素對於泰瑞爾的影響不僅於此，種族因素擴大了黑人女性的活動空間，但也區隔了她們與白人女性主義者的不同，她們的目標在於爭取作為一個人和公民的基本權益，而非執意於性別上的不平等。

本研究亦證明，將種族因素融合到黑人社會對於女性的期待之中，有助於兩性發展互助關係。因為黑人的處境，黑人兩性必須共同面對種族問題的挑戰。當黑人女性在公領域的活動被賦予種族使命時，黑人男性沒有立場限制黑人女性只能在私領域活動，更要協助她們完成使命，黑人男性也必須進入原本屬於女性的私領域，一如羅伯泰瑞爾。種族因素不只讓黑人女性有更多的發展空間，也彌合了黑人兩性之間因為活動空間調整而產生的間隙。

在一切以種族優先之情況下，泰瑞爾不需要在公領域或私領域之間擇一而為，活動空間與關心的議題更為寬廣。於是泰瑞爾可以扮演多重角色，如社團參與者、教育家、國際事務參與者、演說家、母親、妻子等，展開比白人中產階級女性更豐富的活動。

## 參考文獻

- 黃文齡 (2001)。〈1920 年代民間婦女社團之研究——以紐約市婦女俱樂部為例〉，《新史學》，12, 3: 47-104。(Huang, W. L. [2001]. The woman voluntary association in the 1920s: A case study of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New History*, 12, 3: 47-104.)
- Anderson, C. W. (1906). Charles William Anderson to Booker T. Washington, December 11, 1906. In L. R. Harlan (Ed.), *The Booker T. Washington papers* (Vol. 13, p. 519).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Baker, P. (1984). The domestication of politics: Women and American political society, 1780-1920.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9, 3: 620-647.
- Barnett, E. B. (1997). Nannie burroughs and the education of black women. In S. Harley & R. Terborg-Penn (Eds.), *The Afro-American woman: Struggle and images* (pp. 97-108). Baltimore: Black Classic Press.
- Berg, B. (1978). *The remembered gate: Origins of American femi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lair, K. J. (1980). *The clubwoman as feminist: True womanhood re-defined, 1868-1914*.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 Broussard, J. C. (2002). Mary Church Terrell: A black woman journalist and activist seeks to elevate her race. *American Journalism*, 19, 4: 13-35.
- Brown, E. B. (1989). Womanist consciousness: Maggie Lena Walker and the independent order of Saint Luke.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4, 3: 610-633.
- Campbell, K. K. (1986). Style and content in the rhetoric of early Afro-American feminists.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72, 4: 434-445.
- Carlson, S. J. (1992). Black ideals of womanhood in the late Victorian era.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77, 2: 61-73.
- Cherry, E. C. (1997). Sister envoy: Three transcultural performance texts by African-American women travelers (Doctoral disserta-

- 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1997).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A 58/04: 1150.
- Chittenden, E. F. (1975). As we climb: Mary Church Terrell. *Negro History Bulletin*, 38, 2: 351-354.
- Connell, R. W. (1987). *Gender and power: Society, the person, and sexual politic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nway, J. (1971-72). Women reformers and American culture, 1870-1930.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5, 2: 143-177.
- Cooper, A. J. (1988). *A voice from the Sou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tt, N. F. (1990). On men's history and women's history. In M. C. Carnes & C. Griffen (Eds.), *Meanings for manhood: Constructions of masculinity in Victorian America* (pp. 205-212).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Daniel, S. I. (1970). *Women builders*. Washington, DC: Associated Publishers.
- Davis, E. L. (Ed.). (1933). *Lifting as they climb: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ored Wome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ored Women.
- Degler, C. N. (1980). *At odds: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America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llinger, K. (2004). Masculinities in "safe" and "embattled" organizations: Accounting for pornographic and feminist magazines. *Gender & Society*, 18, 5: 545-566.
- DuBois, E. C. (1991). Harriet Stanton Blatch and transformation of class relations among woman suffragists. In N. Frankel & N. S. Dye (Eds.), *Gender, class, race, and reform in the Progressive Era* (pp. 162-179). Lexington, KY: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 DuBois, W. E. B. (1961).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Greenwich, CT: Fawcett.
- DuBois, W. E. B. (1975). *Darkwater: Voices from within the veil*. Millwood, NY: Kraus-Thomson Organization.
- Eisenmann, L. (2005). A time of quiet activism: Research, practice, and policy in American women's higher education, 1945-1965.

-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45, 1: 1-17.
- Eisenstein, Z. (1979).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Flexner, E. (1996). *Century of struggle: The woman's rights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razier, E. F. (1974). *The Negro church in America*.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 Friedan, B. (1963).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Norton.
- Gatewood, W. B. (1990). *Aristocrats of color: The black elite, 1880-1920*.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Gozemba, P. A., & Humphries, M. L. (1989). Women in the anti-Ku Klux Klan movement, 1865-1984.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2, 1: 35-40.
- Hanson, J. A. (2003). *Mary McLeod Bethune and black women's political activism*. Columbia, MO: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 Harley, S. (1982). Beyond the classroom: The organizational lives of black female educators in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1890-1930. *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 51, 3: 254-265.
- Harley, S. (1993). The middle class. In D. C. Hine, E. B. Brown, & R. Terborg-Penn (Eds.), *Black women in America: A historical encyclopedia* (Vol. 2, pp. 786-789).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Hayden, D. (1981). *The grand domestic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feminist designs for American homes, neighborhoods, and citi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Higginbotham, E. B. (1993). *Righteous discontent: The women's movement in the Black Baptist Church, 1880-192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ine, D. C. (1981). *When the truth is told: Black women's 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Indiana, 1875-1950*. Indianapolis, IN: National Council of Negro Women, Indianapolis Section.
- Hine, D. C. (1994). *Hine sight: Black wome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Carlson.
- Hine, D. C. (1996). *Speak truth to power: Black professional class in*

- United States history*. New York: Carlson.
- hooks, b. (1984). *Ain't I a woman: Black women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Jones, B. W. (1982a). Before Montgomery and Greensboro: The desegregation movement in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1950-1953. *Phylon*, 43, 2: 144-154.
- Jones, B. W. (1982b). Mary Church Terrell and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ored Women, 1896-1901.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67: 20-33.
- Jones, B. W. (Ed.). (1990). *Quest for equality: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Mary Eliza Church Terrell, 1863-1954*. New York: Carlson.
- Jones, B. W. (1993). Mary Eliza Church Terrell. In D. C. Hine, E. B. Brown, & R. Terborg-Penn (Eds.), *Black women in America: A historical encyclopedia* (Vol. 2, pp. 1157-1159).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Jones, J. (1980). *Soldiers of light and love: Northern teachers and Georgia blacks, 1865-1873*.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Ladner, J. A. (Ed.). (1995). *Tomorrow's tomorrow: The black woman*.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Lane, A. (1971). *The Brownsville affairs: National crisis and black reaction*. New York: Kennikat Press.
- Lemert, C. (1998). Anna Julia Cooper: The colored woman's office. In C. Lemert & E. Bhan (Eds.), *The voice of Anna Julia Cooper: Including a voice from the South and other important essays, papers, and letters* (pp. 1-50).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 Leone, J. (1989). Integrating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1946-1949. *Historian*, 51, 3: 423-445.
- Lerner, G. (Ed.). (1972). *Black women in white America: 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Lerner, G. (1974). Early community work of black club women.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59, 2: 158-167.
- Lystra, K. (1989). *Searching the heart: Women, men and romantic love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rable, M. (1983). Groundings with my sisters: Patriarchy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black women. *Journal of Ethnic Studies*, 11, 2: 1-39.
- McCluskey, A. T. (1994). Multiple consciousness in the leadership of Mary McLeod Bethune. *NWSA Journal*, 6, 1: 69-81.
- McCluskey, A. T. (1999). Setting the standard: Mary Church Terrell's last campaign for social justice. *Black Scholar*, 29, 2-3: 47-53.
- Meier, A. (1963). *Negro thought in America, 1880-1915: Racial ideologies in the age of Booker T. Washington*.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Miller, M. S. (1976). Mary Church Terrell's letters from Europe to her father. *Negro History Bulletin*, 39, 6: 615-618.
- Morton, P. (1991). *Disfigured images: The historical assault on Afro-American women*. New York: Greenwood.
- Ogunyemi, C. O. (1985). Womanism: The dynamics of the contemporary black female novel in English.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1, 1: 63-80.
- O'Neil, W. (1971). *Everyone was brave: A history of feminism in America*. Quadrangle, NY: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Co.
- Perkins, L. M. (1983). The impact of the "cult of true womanhood" on the education of black women in United States histor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 39, 3: 17-28.
- Render, S. L. (1975). Afro-American women: The outstanding and the obscure.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32, 4: 306-321.
- Rothman, E. K. (1984). *Hands and hearts: A history of courtship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 Ruffin, J. St. P. (1933). Address of Josephine St. P. Ruffin, president of conference. In E. L. Davis (Ed.), *Lifting as they climb: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ored Women* (pp. 17-19).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ored Women.
- Russell, J. C. (1995). The perfect thirty-six: Tennessee and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West Tennessee Historical Society Papers*, 49: 238-242.
- Ryan, M. P. (1983). *Womanhood in America: From colonial times to*



- the present*. New York: F. Watts.
- Shaw, S. (1996). *What a woman ought to be and to do: Black professional women workers during the Jim Crow er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hepperd, G. B. (1959). *Mary Church Terrell, respectable person*. Baltimore: Human Relations Press.
- Smith, J. (Ed.). (1992). *Notable black American women*. Detroit, MI: Gale Research.
- Smith-Rosenberg, C. (1975). The female world of love and ritual: Relations between wome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 1: 1-30.
- Smith-Rosenberg, C. (1985). *Disorderly conduct: Visions of gender in Victorian Americ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Sterling, D. (1979). *Black foremothers: Three lives*. New York: Feminist Press.
- Terborg-Penn, R. (1988). *African American women in the struggle for the vote, 1850-1920*.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Terrell, M. C. (1900). The duty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ored women to the race. *AME Church Review*, 16, 1: 340-354.
- Terrell, M. C. (1902). What role is the educated Negro woman to play in the uplifting of her race. In D. W. Culp (Ed.), *Twentieth century Negro literature* (pp. 172-177). Toronto, Canada: J. L. Nichols & Co.
- Terrell, M. C. (1904). Lynching from a Negro's point of view. *North American Review*, 178, 6: 853-868.
- Terrell, M. C. (1905). The mission of meddlers. *Voice of the Negro*, 566-568.
- Terrell, M. C. (1907). What it means to be colored in the capital of the United States. *Independent*, 62: 181-186.
- Terrell, M. C. (1912). The justice of woman suffrage. *The Crisis*, 4: 5.
- Terrell, M. C. (1927, January 9). *Washington Evening Star*, n.p.
- Terrell, M. C. (1927, May 14). *Washington Post*, n.p.
- Terrell, M. C. (1940). The history of the club women's movement. *African American Woman's Journal*, 1, 2-3: 34-38.
- Terrell, M. C. (1943, September). Needed: Women lawyers. *Negro*

- Digest*, 57.
- Terrell, M. C. (1950). Dr. Sara W. Brown. *Journal of the College Alumnae Club of Washington*, 30: n. p.
- Terrell, M. C. (1953). I remember Frederick Douglass. *Ebony*, 53: 73-80.
- Terrell, M. C. (1977). *The papers of Mary Church Terrell* (Vol. 3, microform by Library of Congress Manuscript Division).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Photoduplication Service.
- Terrell, M. C. (1980). *A colored woman in a white world*. New York: Arno Press.
- Terrell, M. C. (1984). What it means to be colored in the capital of the United States (1906). In J. Anderson (Ed.), *Outspoken women: Speeches by American women reformers, 1635-1935*. Dubuque, IA: Kendall Hunt.
- Terrell, M. C. (1990a). First 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ored Women. In B. W. Jones (Ed.), *Quest for equality: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Mary Eliza Church Terrell, 1863-1954* (pp. 133-138). New York: Carlson.
- Terrell, M. C. (1990b). The duty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ored Women to the race. In B. W. Jones (Ed.), *Quest for equality: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Mary Eliza Church Terrell, 1863-1954* (pp. 139-150). New York: Carlson.
- Terrell, M. C. (1990c). The history of the club women's movement. In B. W. Jones (Ed.), *Quest for equality: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Mary Eliza Church Terrell, 1863-1954* (pp. 315-325). New York: Carlson.
- Terrell, R. H. (1904). Theodore Roosevelt. *Voice of the Negro*, August: 542-544.
- Terrell, R. H. (1977). *The papers of Robert H. Terrell* (microform by Library of Congress Manuscript Division).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Photoduplication Service.
- Walker, A. (1983). *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 Womanist prose*. San Diego, CA: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Washington, B. T. (1895). *Atlanta compromise of 1895*. Retrieved June 17, 2009, from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Center for History

- and New Media Website: <http://historymatters.gmu.edu/d/39>
- Washington, B. T. (1972-1989). *The Booker T. Washington papers* (Vols. 1-13, L. R. Harlan, Ed.).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Welter, B. (1973). The cult of true womanhood: 1820-1860. In M. Gordon (Ed.), *The American family in social-historical perspective* (pp. 313-333).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Welter, B. (1976). *Dimity convictions: The American wom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thens, OH: Ohio University Press.
- Wesley, C. H. (1984).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ored Women's Clubs: A legacy of servic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ored Women's Clubs.
- West, C., & Zimmerman, D. (1987). Doing gender. *Gender & Society*, 1, 2: 125-151.
- White, D. G. (1999). *Too heavy a load: Black women in defense of themselves, 1894-1994*. New York: W. W. Norton.

## A Case Study of Mary Church Terrell, 1891-1925

*Wen-Ling Huang*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No. 128, Sec. 2, Academia Rd., Taipei 11529, Taiwan  
E-mail: wlhuang@sinica.edu.tw

### Abstract

Historian Shirley Carlson used the “Black Victorian” to expound her view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lack women in public/private spheres. According to Carlson’s definition, the “Black Victorian” refers to the cult of Black womanhood. In this article, I wish to discuss the “Black Victorian” and the influences of racial reasons on black gender relations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Mary Church Terrell in 1891-1925. It is asserted that black women should follow the spirit of the cult of true womanhood in the private sphere, but they are also expected to be active in public sphere for the sake of their race. Once black women accepted responsibility for “lifting race,” there were no reasons for black men to interfere in women’s activities in public spheres. This provided black women with opportunities for self-development unavailable to white women, but was also expressive of the obstacles the black women faced—race and gender. Furthermore, when black women could play active roles in the public sphere for the race, Black men should take up some responsibilities formerly assumed by women in the private sphere. Thus, interactions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Black communities also changed. The case of the Terrells provide a good example of this.

**Key Words:** Mary Church Terrell, Robert H. Terrell, Black Victoria, political domesticity